

宝庆讲寺丛书

中国佛教学者文集

朗宇法师 主编

中国佛教与哲学

赖永海 著



宗教文化出版社

宝庆讲寺丛书

中国佛教学者文集



赖永海
著

中国
与
佛教
哲学

主编 朗宇法师
副主编 圣凯道坚 黄夏年

宗教文化出版社

3A W82/02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佛教与哲学/赖永海 著. -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4

ISBN 7-80123-618-1

I. 中…… II. 赖… III. ①佛教-中国-文集②哲学-中国-文集 IV.

①B94-53②B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068359 号

中国佛教与哲学

赖永海 著

出版发行: 宗教文化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后海北沿 44 号 (100009)

电 话: 64095215(发行部) 64095210(编辑部)

责任编辑: 霍克功

版式设计: 司博文 陶 静

印 刷: 北京柯蓝博泰印务有限公司

版权专有 不得翻印

版本记录: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2.875 印张 265 千字

2004 年 8 月第 1 版 200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000

书 号: ISBN 7-80123-618-1/B·220

定 价: 28.00 元

总 序

从佛法本身来说,教、理、行、证的修学次第,已经为佛弟子指明了修学的道路。但是,佛弟子因为自己的资质、喜好的不同,往往有所偏向,于是形成不同类型的佛法,有重义理、重实践等区别。但是,作为佛弟子来说,义理的探讨是为了将佛陀所要开示的真实事理,充分、完整地表达出来,如“阿毗达摩”虽然着重于论证“法”的自性、定义、关系等,但是其本意仍然在于“谛理的现观”,最终归于修证。那么,重修证的佛教,主要是从利益众生的角度,重视佛法的适应性、实效性,所以对事相的分别比较少,如初期大乘经典以“般若”、“三昧”、“解脱门”、“陀罗尼”、“菩提心”等作为中心,来表达从发趣、修行、证入的历程。虽然存在着种种不同的侧重,但都是佛法的根本,都是以义理知识与实践经验相结合为中心。中国佛教其实已经非常明显地表明了这一点,如天台智者大师的教观并重,这是中国佛教的优良传统。《高僧传》将古代僧人分为十科,其中翻译、解义、读诵便属于义解门;而习禅、明律、感通、遗身、护法、兴福,都是属于实践门;最后一科“杂科”则是指出家人的外学修养,傍及世间经书、治世语言、礼乐文章等,无不兼通。





但是,传统意义的佛教义解,主要是注疏经、律、论,在“述而不作”中表达自己的理解与观点,当然也有一些专门性的著作。而且,这些佛教义解僧,都是从自己的信仰与经验出发,通过注疏、论著,来达到实践与弘法的目的。南北朝佛教的兴盛、隋唐佛教的辉煌,都与义解的繁荣是分不开的。而禅宗的发展则为中国佛教注入新的生命,重视主体的体认、自己身心的解脱、净土法门的流行,激发了信仰佛教的感情,为佛教走入社会提供了方便。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随着禅、净的流行,在这种“简单”、“不立文字”的潮流下,中国佛教徒逐渐失去探讨高深佛理、考察繁琐戒律的兴趣。于是,中国佛教重视义理研究的优良传统便丧失殆尽。

另一方面,佛学研究在佛教界之外却成为一门世界性的学问。近代意义上的佛学研究,应该是开始于欧洲殖民主义者侵入亚洲地区,殖民者为了维护自己的殖民统治,必须要深入研究亚洲的宗教及其文化。于是,通过接触梵文、巴利文等东方语言,开始了解佛教的理论,消化佛教的教义。在“理性主义”、“科学主义”思想的影响下,这些学者注重现代佛学研究的客观性、纯学术性,形成了佛学研究的现代传统,于是佛教便成为一种学问——佛学。19世纪后期,日本佛教界开始运用西方的学术研究方法,从而推动了日本佛学研究的兴盛与发达。随着“西学东渐”、日本佛教对中国佛教的影响增强,中国开始有了近代意义上的佛学研究,这在当时中国佛教界引起很大的反响与回应,如《大乘起信论》、《楞严经》的辨伪,“大乘佛教非佛说”的讨论,“佛教非宗教非哲学”之辩等。同时,佛教界受时代流行的学术方法的影响,尤其是以太虚大师

为首的“人生佛教”运动，佛教理性主义思想的高扬都直接推动了佛教界从事佛学研究，其中以印顺法师的成就最大。但是，相对来说，学术界则在佛学研究上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像吕澂、陈垣、汤用彤等，皆为一代学术大师。

改革开放后，中国佛教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经过二十年的努力，佛教界基本上完成了修复寺院、重塑佛像的工作，寺院呈现出游人如织、香火旺盛的现象。于是，培养人才、弘法、学术研究等工作提到首要位置。然而，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各方面人才的紧缺无形中遏制中国佛教事业的发展。而人才的成长与培养，这又与佛教界的观念与重视程度是成正比的。

近代佛教学术研究的发展，由于受到欧美治学风气的影响，文献学、考据学、思想史、语言学、社会学、人类学等方法被大量地使用，对佛教进行理性地分析，定性定量，促使了人们对佛教认识更加深入。学术研究作为一种工具，用来剖析佛教的历史与思想等等领域，扩大了佛教的知识面，更突显了佛教的悠久历史和文化积淀。学术研究利用各种先进的研究方法，通过对各种文献的比较研究，不断挖掘利用新出土的资料，显示其优胜之处。通过学术研究，使佛教的思想体系与历史发展脉络更加清楚，提高了人们对佛法的正确认识。从事学术研究的社会学者本身就是社会的精英，对社会了解非常透彻，其思想观点往往能够补充僧界的不足；同时，他们作为佛教界与社会沟通的桥梁，圆融转化佛教的思想，向社会表达佛教的看法，这些都是有益于社会与众生的活动。

因此，佛教学术研究的根本意义，不仅是了解存在于一定





时空中的佛教发展形态,而且更是从现存的文献、文物中,去伪存真,去粗取精,探索其前后延续,彼此关联的因果性;从而更清楚地认识到佛法的本质,及其因时、因地的适应。以了解过去,承受根本的佛法特质,作为我们信行的基础,这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中国佛教协会第七届佛代会便提出要契理契机地弘扬“人间佛教”思想,其中一项重要内容便是“以文化阐扬佛法,佛教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契理契机地以文化阐扬佛法是实现佛教中国化、本土化、现代化的权巧方便。”现代中国佛教界,应该认真地认识学者们的新观点,吸收其中的有用之处,通过转化与变通,仍然能够落实到佛法的信仰与实践,佛教才具有更大的潜力。

宁波宝庆寺始建于北宋端拱二年(989),至今已有千余年的历史。嘉定十五年(1222)宋宁宗赐名“宝庆讲寺”。寺里历代住持及僧众均有重视义理、尊重学术、礼待学人的优良传统,一直讲法不辍。曾在中国历史上流传最广,现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定为世界性启蒙教材《三字经》的作者王应麟曾为宝庆寺撰写了《宝庆讲寺记》。大儒黄震为寺里撰写了《宝庆寺观音殿记》。此二文的碑刻至今仍然保存完好,高高地耸立在寺里。现在宝庆全寺僧众十分重视自身素质的提高,在日常事务、早晚功课、坐禅念佛等之外,勤于读书,研究经论。我本人自从出家以来,参访名山大寺,受到多位高僧大德善知识的指点,喜欢研读经论及现代学者的研究著作。因此无论到哪里,我都会带上一些书,也经常会到各地的书店去逛逛,看到佛教书籍经过十多年的出版,已经蔚为大观,感到欣慰。但是,对于社会的需求和佛教文化的发展,目前出版的书籍远

远无法满足人们对佛法的需求,而且现有书籍之中,难免良莠不齐,精品佛教图书仍然少见。有感于此,我和道坚法师、圣凯法师、黄夏年先生进行一些交流,得到他们的赞同与支持。于是,我们决定以本寺的名义出版一套丛书,希望能够推进佛学研究的发展,让佛法能够深入社会人心,达到净化人生的效果。

朗 宇

2004年6月21日于宁波宝庆讲寺



总

序

我的佛学研究之路(代序)^①

赖永海

我的接触佛教,始于童年时代。老家福建闽南一带,自古以来佛教较盛行,从孩提时代起就常有缘耳闻乃至目睹佛教超亡荐福、烧香拜拜等法事举行,对佛教很早就有一种神秘且敬畏的感觉。后来上了大学,读的是哲学专业,虽然也偶尔涉及佛教,但对它多取敬而远之的态度。1978年报考中国哲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复试时曾被老师问及:“如果需要的话,录取后把你调整到佛教专业,如何?”记得我当时委婉回答:“最好还是读中国哲学专业。”——因为那个时候,我心目中的佛教仍然是缥缈香烟后的顶礼膜拜和抽签问卜,而我向来较感兴趣的是哲学,尤其喜欢一些思辩的哲理和哲理的思辩,故而对研究佛教颇不以为然。但是,硕士生阶段的三年专业学习,逐渐改变了我对佛教的看法。

首先得感谢我的导师任继愈先生,是他把我引上了学习和研究佛教之路。我在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当硕士生时,虽然读的是中国哲学专业,主攻方向是王船山,但因当时的中国

① 此文原为《中国佛性论》1999年再版序言。

哲学专业设在宗教学系，任先生又是儒释道三教兼治之大家，所设课程有佛教概论、佛教史、佛教经典选读等，使我自觉不自觉地开始较系统地接触佛教。

在学习佛教过程中，有一本佛教典籍对我颇有触动，那是作为“附录”收在任继愈先生之《隋唐佛教思想论集》一书中的《不真空论》。

《不真空论》系东晋佛教思想家僧肇所撰。僧肇素有“中土解空第一人”之称，而在我的印象中，佛教思想中最为玄奥者，莫过于谈空，所谓“空不异色，色不异空；空即是色，色即是空。”乃是许多文学书籍乃至影视作品显示佛教“禅机”的口头禅，我当时颇想借这本书去窥探一下佛教思想之堂奥。但是，我这个向来颇以“喜欢思辨的哲理和哲理的思辨”自许的读者，在连读了好几遍《不真空论》后，仍然不得书中之要领，这使我开始从理论思辨的角度真正重视起佛教的学说。后来对佛教典籍的较系统研读使我进一步确信，以往被误解为只是超荐送亡、烧香拜佛乃至于常被斥为迷信的佛教，实在是一座博大精深的人类思想宝库。

1982年我国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我毅然选择了“中国佛学”的研究方向。先是在导师孙叔平先生的指导下，较系统地阅读了一批佛教典籍。孙先生是著名的中国哲学史家，他为我所开列的佛教书目，多是从中国哲学的角度切入，这对我后来的研究多侧重于佛教中的哲学思想颇有影响。1983年孙先生因心脏病猝发不幸逝世，我又回到任先生门下，继续修完博士生课程和撰写博士论文。这一阶段的学习，完全遵照先生的教导，一是掌握方法，二是大量地研读原著。





就方法而言,笔者以为历史唯物主义不失为研究佛教的一种较好的方法或最好的方法之一,它的长处在于不是就佛教论佛教,就佛经解佛经,而是把佛教的产生与发展、把特定的佛教学说放到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之下进行考察,这对于理解和说明佛教的本质和佛教的发展规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当然,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海内外学术界乃至宗教界也许有不同的看法,有些人把它与纯粹的批判宗教混为一谈,有的则把它与阶级分析的方法等同起来,实际上这是一种误解。造成这种误解有其历史的原因——因为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宗教研究几成禁区,特别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那种对佛教乃至一切宗教的毫无分析的漫骂和批判,常常被冠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这就难怪人们对这种方法望而生畏。其实,“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的最基本的精神,就是坚持以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去说明包括宗教在内的一切社会文化现象,这丝毫不意味着对宗教只能批判否定而不能分析研究,恰恰相反,客观地评价宗教在人类发展过程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科学地说明各个历史时期宗教为什么会产生和发展?为什么在某一历史时期所产生的是此种宗教而不是那种宗教?各种宗教为什么会这样发展而不是那样发展?例如,佛教作为一种外来宗教为什么能够在中国站稳脚跟并持续发展?而在其发源地却风光不再?为什么佛教的大小二乘同时传入中国,而在汉族地区小乘佛教一直发展不起来,大乘佛教却能经久不衰?为什么佛教能够与中国传统的儒家学说交融合一,而其他的西方宗教却很难做到这一点?佛教在现阶段的中国社会究竟会怎样发展?凡此种种,如果不把佛教放在



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去进行考察,而企图就佛教论佛教,是根本做不到的。

当然,正如世界上的许多事物都是一个复杂的多面体,对它们的分析研究不能也不应该是单方面的,而应该是多视角、多层面一样,对于佛教乃至一切宗教的研究,方法也不应该是单一的,除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之外,诸如人类学的方法、社会学的方法、心理学的方法,乃至现象学、分析哲学的方法等等,举凡有助于揭示佛教的思想特质、历史发展、社会功能的任何方法,都没有理由反对让别人去采用。实际上,不同的研究方法对于人们认识和把握对象往往会起到相得益彰的作用,如果人们能用尽可能多的方法、从尽可能多的角度去研究佛教或其他宗教,那么,对于佛教或其他宗教的了解和认识就会愈全面和具体,从而使自己的认识更接近真理——因为人类的认识就是一个不断从抽象到具体的过程。不过,就某一个人来说,自然不可能同时采取许多方法去进行研究,究竟采取什么方法为好,这应该根据各自的学养和理论准备而定,不可强求一律。

至于研读原著,这是学习、研究佛教的基本功。佛教号称八万四千法门,经典浩如烟海,没有坐冷板凳的精神,是难入其门的。如果说笔者在佛教研究方面也曾得到些许收获,在某种意义上说,全然得益于当年硬着头皮、锲而不舍地啃完一部又一部佛经。这里要顺便感谢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部的各位教师,特别是当时古籍部主任蒋老师。20世纪80年代南京大学图书馆里,只有一部《大正藏》,按照规定只能到古籍阅览室阅读而不准外借,而我当时住在离校十多公里的紫金山



下,如果每天往返奔波,要浪费许多时间和精力,经蒋老师特批,允许我一部一部地借阅。因为是借来的,阅读时笔记卡片做得特别勤,到临撰写博士论文时,我的佛学笔记竟达厚厚的十六本,读书卡片更是数千张。这些读书笔记和卡片对我后来撰写博士论文的帮助之大,实在是始料未及的。为撰写《中国佛性论》,我整整“闭关”三年,潜心佛经,但从提笔撰写,到全书完稿,仅仅用了四十天时间。想起当年撰写论文时,几乎每一个章节,都有数百条资料索引和卡片在等待录用,所以写起来颇有信手拈来、一气呵成的感觉,这与有时为了写一篇应景文章但准备不足时,一提笔三挠腮,冥思苦想,坐立不安适成鲜明对照。

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佛教,虽然具有一般宗教的许多品格与特征,但又与其他宗教有着若干差异。例如,举凡宗教,都十分注重对人格神的信仰,但佛教既反对纯粹依靠信仰,更否定人格神的存在,它最强调的是“智慧”,注重“慧解脱”,亦即平常所说的“大彻大悟”。佛教的这一特点,导致了历史上许多学者和僧人曾经提出佛教不是一种宗教,而是一种哲学。有鉴于此,对于佛教,应该或者更准确点说,可以从更多的角度对它进行研究,特别可以从哲学的乃至从社会文化的角度对它进行研究,笔者的研究佛教,就较侧重于佛教的哲学思想、理论思辨方面。

与我国高等院校的许多佛教研究者原来多是研究中国哲学的一样,我的佛教研究,也是从中国哲学切入的。这种情况的出现,主要是因为中国佛学与中国哲学的关系确实十分密切,人们曾经对古代中国哲学有过一个概括,所谓“先秦子学,两汉经学,

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此中除却先秦因佛教尚未传入,无从谈论佛教与中国哲学的相互关系,从两汉开始,佛教与中国哲学就发生了密切的联系,特别从魏晋之后,人们研究中国哲学,就不能置佛教于不顾。例如,魏晋佛教般若学的传入,起初就是借助于玄学的,后来般若学与玄学合流,最后,般若学因其“不落有无”较之玄学的谈“有”说“无”更抽象,理论思辨更高,遂取代了玄学,成为玄学的出路;到隋唐,由于强大的唐王朝在文化上采取比较开放的政策,中国古代的三大学术流派儒、释、道三家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而如果就哲学思想言,尤以佛教为甚,其时之天台、华严、唯识、禅宗四大佛教宗派的哲学思想,无论就其体系之庞大,抑或就其思想之精深缜密,都远远超出儒、道二家,因此之故,人们习惯于把隋唐哲学概括为“隋唐佛学”;至于宋明理学,则先贤时哲都称之为“儒表佛里”、“阳儒阴释”。也就是说,它表面上是儒学,骨子里是佛学。宋明理学亦称“新儒学”,其“新”就“新”在以“心性本体”取代了传统儒学的“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而这种本体论的思维模式,就是受到佛教佛性本体论思维模式的影响。

通观古代中国哲学的历史发展,人们合乎逻辑地得出一个结论,即不研究中国佛教,就不能完整、准确地理解和把握中国哲学。

其实,不唯中国哲学为然,从某种意义上说,整个中国古代文化都与佛教有着不解之缘。例如,素有“华夏文化冠冕”之称的诗、书、画,就受到佛教的极其广泛和深刻的影响。中国古代之诗、书、画,向来注重意境、气韵。所谓意境、气韵,也就是一种内在情感与外在境物的交融合一的艺术境界。这种





艺术境界往往是一种整体的感受,只能意会不可言传,只能体悟,不可分析,这种注重“会意”、“体悟”的艺术境界,无疑受到中国佛教特别是禅宗注重“顿悟”的思想模式的影响。

并非因为自己研究佛教就极力夸大佛教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的地位与作用,实际上,佛教对于中国古代文化的影响是客观而广泛的,正因为这样,我国的佛学研究,十几年前多停留在中国哲学界,今天已经逐渐发展到文学艺术、雕塑建筑乃至音乐戏曲诸领域;如果说,十几年前从事佛教研究尚有“钻冷门”之嫌,那么今天人们大可把佛学研究放到整个传统文化研究的大热潮中去进行。

从致力于佛教研究开始,到现在已近 20 个年头了,在这段时间内,最令我聊以自慰的,就是自己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能坚持不懈地致力于佛学研究,从潜心研读和整理佛典,到致力于探讨佛教的佛性理论,从研究佛教哲学到探讨佛教与儒学、佛教与诗书画等中国古代各种文化形式的相互关系,每选定一个课题,就全力以赴,务求做出成果。今后,在佛教研究方面将主要做好两件事:一是利用南京大学的博士点和硕士点,多招研究生,带好研究生,为我国的佛教研究尽可能多培养一些人才;二是如果条件允许,我将对中国佛教中的哲学思想进行一番较深入系统的梳理与探讨,试图撰写一部在体系建构和理论思辨两方面都能有所突破的《中国佛教哲学》,能否成功,现在还不得而知,但我一定会竭尽全力!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佛教研究的路还很长很长,我将一如既往地走下去!



目 录



目
录

总 序	朗 宇(1)
我的佛学研究之路(代序)	赖永海(6)
缘起论是佛法的理论基石	(1)
试论佛教对中国传统思维模式的影响 ..	(9)
佛性与人性	(29)
——论儒佛之异同暨相互影响	
佛性学说与中国传统文化	(45)
论六祖革命	(60)
禅宗前后期思想比较研究	(69)
祖师禅与分灯禅	(83)
——兼论中国禅与日本禅	

从祖师禅到看话禅·····	(101)
——宋元禅学管窥	
禅宗何以能成为中国佛教的代表·····	(119)
净慈道济与后期禅宗·····	(126)
佛教与人生·····	(141)
太虚大师与人生佛教·····	(156)
人间佛教与佛教的现代发展·····	(168)
佛学的儒学化与儒学的佛学化·····	(189)
——以《坛经》、《复性书》为例	
宋元时期佛儒交融思想探微·····	(204)
佛性·本心·良知·····	(216)
——陆王心学与佛学	
柳宗元与佛教·····	(234)
宗教与文化·····	(249)
——兼论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性具与性起·····	(256)
——天台、华严二宗佛性思想比较研究	
禅净异同论·····	(289)
王夫之辩证法体系探索·····	(331)